

引领风尚 迈向高峰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述评 □何向阳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于2018年8月11日揭晓,9月20日在北京颁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6卷本同期出版。作为具有国家荣誉的重要文学奖之一,鲁迅文学奖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以推动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是党的十九大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文学评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的重要思想论述,发挥文学评奖工作的导向作用,把真正体现新时代中国文学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优秀作品遴选出来,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具体要求。

于此,在修订《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及《细则》基础上,评奖办公室于3月15日,发布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公告,经过公示和初步审核,计有1373篇(部)作品参评。中国作家协会聘请77名来自全国的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各奖项评奖委员会。6月15日,评委开始作品阅读。7月28日,各评奖委员会集中评议,经过反复讨论和四轮投票,8月7日产生七个奖项各10篇(部)提名作品。提名作品公示后,评奖办公室将收到的反馈意见提交各评委会,8月11日,各评委会进行第五轮投票,评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七个奖项共34部获奖作品。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会议批准,评奖结果发布后,即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大家一致认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思想论述指引下文学由“高原”迈向“高峰”的重要见证。

现实题材的深入掘进

34部获奖作品,总体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广大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四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理论评论和文学翻译成果的一次检阅,获奖作品题材多样、主题鲜明,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出多元性,但在文学视野的广阔性

和表现内容的丰富性同时,现实题材的深入掘进是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主要特征。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记述了国家领导人与作家之间的日常交往和真挚情谊,“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朋友之间的两心如月、肝胆相照让人读来感念非常。《乡村国是》是纪红建行走上万公里,寻访202个村庄对中国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故事的真切记录。书后附录涉及湖南、云南、宁夏、甘肃、新疆、贵州、广西、福建、重庆、四川、湖北、江西、安徽、西藏等地202个村庄的名单,读来让人肃然起敬,作者全景式的视野和带温度的报告,让我们看到30多年来党中央关怀下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的成果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为写出现实生活的宏阔场景与鲜活质感到火热生活中去为人民的创造所动情的作家形象。2014年6至8月,应国家海洋局、中国大洋协会之邀,许晨随同我国深海潜水器“蛟龙”号前往太平洋科学考察,《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是反映我国载人潜水器研发海试的报告文学,这不是一般的工程报告,它写出了人类对南极、北极以及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之外的,对数千里乃至上万公里以下的海底世界最深极的征服与探索,作为时代文明的记录者和推动者,作者以激情满怀、沉潜生活的文学书写,体会勇敢,感念崇高,以大量的事实细节书写了改革开放后科技专家与技术人员的拼搏,以一种对奋进生命的歌赞传达出中国人民“胸怀大海、走向世界”的襟怀和胆魄。现实题材所关注的核心是人民,人民是文学的书写中心,《舟的(出警)》写的是保卫普通人生活安宁的普通人的工作,李修文在其散文集《山河裂》自序也记述了自己在医院陪护亲人的经历,在开水房、注射室、天上、水塔边、芭蕉树下,与普通人的遭遇,让他立意继续写作并写下“我的同伴和亲人”,正是人民,“人民”在这里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他们,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在“我”与“他们”之间找到血肉联系之后,作者感叹,“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李修文曾赶赴汶川地震现场参与救助,在记录汶川地震的文章结语中写到:“许我背靠一座不再摇晃的山岩;如果有可能,再许我风止雨歇,六畜安静;许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惯常和微小的事物教会作家并最终完成了对作家个体的“救赎”,那文中一再出现的震后“一个孩子正捕捉萤火虫”追逐光明的意象,不正是那句由来已久诗句的呈现:“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不向你的灵魂脱逃?我怎能让它越过你,向着其他的事物?”

历史溯源中的文化自信

文学对于新时代的多层次多侧面表达,显示了作家在现实把握上的深入思考与艺术掘进。与

此同时,文学还呈现出另一种面向历史、溯源传统时的高度的文化自信。首部赢得鲁迅文学奖的小小说作品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以娓娓道来的文化耐心讲述了天津卫人的血性和一座城市文化血脉的养成,城市是有灵魂的,城市的灵魂就是这城市中人的品行与人格,在对文化人格的提炼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个性,而在鲜活的个性中又有着与仁义传统的深在贯通。同样,在《北京:城与年》中,宁肯以自己的儿时经历探讨了一个人与一座城的关系。筒子河、城墙、角楼、胡同、会馆、夹道、防空洞——复活,琉璃厂、荣宝斋、北图、美术馆、新华书店、红塔礼堂都与个体生命的成长发生着深在的联系,此种记忆考古,正如老舍所言:“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一个我!”小白的《封锁》讲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周详贻博的细节考据、重重镜像的风俗还原,使抗战时期的上海在沦陷与封锁的暗处迸发出民族大义的壮烈光芒。

肖江虹的中篇小说《傣面》书写傣村傣师的生活与情感,与之对应是一位离乡失意的青年女性对于生活和情感的自疑与再寻,一边是沉潜于古老民间文化的传承之中,而“看着矮凳上的人,又看看水缸里头的人,泰安顺不晓得到底哪个自己才是真的”的生命与传统的叠印;一边是“本来得意地认为,每天的恶言相向能将世间的温情痛快地杀死。渐渐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倦怠与无聊,作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是如何浸润和改造了我们的生活态度的,还以“各有各的秩序,各有各的经纬,不同时空在那一瞬被接通了”的叙事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更大的宇宙空间。夏立君的散文集《时间的压力》追溯屈原、李白、司马迁等历史人物的文化人格,试图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人文精神的薪火传承,其中的文化自信是何等动人。丰收的《西长城》以40万字的体量全景展现了新疆兵团60年的壮丽历史,几代人屯垦戍边、建政维稳、修渠饮水、开荒造田、植棉种瓜,那是一种建设新生活保卫新生活的信念支撑起的长城,令人在历史的回溯中肃然起敬。历史有时并不距我们很远,它有时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尹学芸的《李海叔叔》都写到父辈,时间段都集中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视角也都是作为女儿的观察和亲历,后者父亲每年大年初一在河堤的暮霭中无数次接李海叔叔的情景,和“我”作为联络员、李两家的纽带翻山越岭去给苦梨峪的李家送麦子的情节,读之令人动容。苦日子里的帮衬与救助,使得作家体悟到两个人的待人之道,“我们这代人,到底跟父辈有着不小的差距,他们能把友谊保持几十年,我们却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到结论”。面对“这不止是心态问题,应该说,骨子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的反思,黄咏梅的“父亲”有着那代人的洒脱,这个走过天路与共和国同龄的卡车司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欺骗时能保持做人的从容和优雅,游泳的“他”和货船交汇之后,“父亲又回到了河中央,他安详地仰躺着,闭着眼睛。父亲不需要感知方向,他驶向了远方,他的脚一用力,运

河被他蹬在了身后,再一用力,整个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这是何等的人生自信,而写出这般自信的又是何种文化自信在支撑着作家?文学理论评论中,白烨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思想论述的文集《文坛新观察》、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专著、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的论文,均显现出文学理论评论界深入问题、尊重事实、捍卫历史的文化自信与理论创新。

日常生活中的诗性发现

“一缸浆水的馨香滋养两个家庭的日子又开始了。”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所述改革开放之初的贫困地区生活虽并不富裕,但人与人关系的质朴如浆水中的酸菜一样滋味绵长,亲情之中,是爷爷对生活的满足与自得,“放下筷子,朝向的光从向东的窗口照进来,光斑洒了爷爷一脸,他一脸金黄,很快这层金色绽开了花,冰面破裂了”。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写初中从外地转京读书的女同学的成长,就是在重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在一个人对抗一家的叫喊、哀号与颤抖中,在做生意、投资被骗、割腕自残的人生大起伏中,仍闪现着一个月夜中伫立在庭院里听小提琴倾诉的身影,一个一直想买一架钢琴热爱着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女孩子,她的理想就是“想活得有点人样”。朱辉的《七层宝塔》写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明的无可依傍,大地被大路小道画成了格子,宝塔被盗,邻里关系紧张,但“不知道怎么安置自己这个身子”的唐老爹仍坚韧地寻求着内心的安宁。这令人想起阿妈斯娟的哀伤,“我的蘑菇圈没有了”,那是守卫者的哀伤,阿来的《蘑菇圈》写一位女性对美好自然的守卫,他把她放在一个更大的天地里,“五月,或者六月”,“听见山林里传来这一年第一声清丽悠长的布谷鸟鸣时,人们会停下手里正做着活,停下嘴里正说着的话,凝神谛听一阵”,这是日常生活中美的停顿,它庄重到“所有卵石、胎生,一切有想、非有想的生命都在谛听”。“一朵一朵的蘑菇沾着新鲜的泥土、苔鲜和栎树残缺的枯叶,正好在新劈开的木柴堆上一——晾干,它们散发出的香气和栎树香混在一起,弥漫在整个院子”。这是饥荒年的日常,是困难时期人所感知的自然的能量。这种能量,在汤养宗的《去人间》、杜涯的《落日与朝霞》、胡弦的《沙漏》、陈先发的《九章》、张执浩的《高原上的野花》中比比皆是。心灵与自然、生命与万物之间的微妙关联赋予了语言以新的面目。日常生活中的诗性发现,体现着一个时代的诗人与作家对生活的深在热爱与真挚信念。

自然观照中的浪漫情怀

布谷、画眉、噪鹛、血雉,覆盆子、蓝莓、沙棘果、蔓青,还有苦菜、鹿耳韭、牛蒡,我们的文学中有多久没有这些鲜活的景象了?法海说:“来世我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

广阔的多样性与深刻的当代性

□张燕玲

现实感与时代感。这些有劲道的作品,都各自为现实主义写作、为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叙述可能性。

在历史的变迁中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乃至日常人间、人际与家庭的对抗与和解,同样蕴含现实感与时代感。获奖作品《蘑菇圈》是阿来创作的格物系列之一,所谓格物后知。此次阿来探究的是川属藏地蘑菇松茸对不同时代人们的影响,以及使从山珍在不同时代此消彼长的人的世界。叙述还是传统的写实,但阿来不愧为白描高手,笔尖灵动飞扬,蘑菇的生长吱吱声响,万物人世也遍地应着,而且蘑菇圈的扩大、缩小与消失,一一相融于人事与时代的变迁,在与不同时代息对应的工作组一次次进驻机村之中,人事与万物渐次变化,并演绎着风声水起的现实传奇。人物个个鲜明饱满,其中女主人公斯炯始终向善守持、坚韧隐忍,竭尽心力为人儿女,为母为姐,甚至宿命般重蹈母亲之命,闭口不提儿子的无名父亲,生命中隐忍深重的痛苦,勇敢而慈悲,年复一年养护着自己的人生秘密和“蘑菇圈”(家园),尽管市场经济与信息时代曝光了她的秘密,但这位精灵般的藏族姑娘,凝结了阿来极大的善意与极大的敬意,她的存在,让一切世相人事困扰坍塌,以至最大限度的人性之和解,充满人生的况味,还值得称道的是阿来的叙述体现的汉语之美,精确鲜活,借助于傣面的兴衰,为颓败的乡村文明与民俗传统唱了一曲悠长的挽歌,同时也为传统与当下达成了和解。因为泰安顺作为雕刻傣戏面具的传人和傣村的引路灵童,在一直唱颂傣的过程中,在今人与先祖、生者与逝者之间搭建了一座灵魂往复的桥梁,但是如此独特的文化民俗景观也在城乡流动中走向

衰亡。泰安顺的儿子们从城里回乡埋葬父亲,同时也把神具——各式傣面付之一炬。来自傣面文化传人后代的一把火,把乡村文化与民俗传统的颓败裸露得触目惊心,令人震撼也催人反思:连传人的后代都不需要傣面,精神的寄托与生存的仪式感被简化了,于乡村老耆或民族地区的读者也许会异议,但于乡村年轻一代似乎又是一种解脱,是人与当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抗争与和解。这便是世道人心,这便是现实感与时代感。肖江虹的笔力精准郑重、冷峭犀利。

《李海叔叔》也是一个在人性幽明的缝隙里深得人生况味的独特故事,尹学芸善于在时代变迁中发现日常人间、人际与家庭情感的丰富性。李海叔叔与“爸爸”的几十年往来,从困难时期两个家庭两代人的相互期待、相互守望与相互成就,到时代更新之后的相互回避,把时代变迁中人际与家庭情感的裂变、人性幽明的丰富性,相生相应于庸常琐碎近30年的家庭生活中,情感饱满而内敛节制,亲切而密实,灵动而沉重。马金莲的《白衣秀士》,其叙述也呈现了如此隐忍又向善、清静而流丽的艺术魅力。

如此情感的丰富性,并于此成功地成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新人形象的还有刘建东《阅读与欣赏》中的女师傅、李凤群笔下的良霞,则出乎其表,入其内里,直抵深处幽明的世道人心。李凤群的《良霞》则深情书写了良霞在世事人生变故中,向死而生,以病痛之躯对命运的抗争中与人的和解,上善若水。这种情感思想都有重量的作品,还有陈希我的《父》、胡性能的《生死课》。《父》笔尖聪敏而犀利地层层撕裂中家庭的外衣,让每个人在审父中自省,从而在传统“父慈子孝”家庭伦理的溃败与内心的荒凉中,实现灵魂的拷问。《生死课》讲述了普通百姓关于生与死的课题,无论生还是死,都赋予了足够的尊重,使主人公小久作为人生摆渡者的形象得以鲜活动人,卑微而正大,颇具现实感与时代感。

多样性的艺术探索,植根于传统,从而实现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与审美意义。艺术形式的探索是创作永恒的课题,今天的作家早已不担心“写什么”,他们处心积虑的是“怎样写”,以找到自己作品样貌的独特美感。本届中篇小说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其中《封锁》《空山》等属于有独特追求的代表。小白的《封锁》集结了众多小说表现手法,渗入每个人物、

每个细节,可谓叙述艺术独树一帜,在本届申报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作者深得侦探小说要领,细致描述了上海公寓甜蜜大厦发生爆炸暗杀了汉奸头目,以及日军封锁公寓抓捕刺客的事件,逼真再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孤岛”时期的上海,细节如考古般详实,直面“抗日”,描写以一己之力周旋、抗衡日寇的英勇豪举,视角独特,结构奇诡。小说把人事封闭于公寓的几天里,让这个公寓的居民拿肉身住在小小的公寓丛林中如无头苍蝇般乱窜,恐惧紧张,危机四伏,险象丛生,却无处逃遁,所有的人物关系得以戏剧般集中展现,所谓甜蜜大厦不甜蜜。狡猾凶残的日军林少佐在封闭式的恐怖调查中,让鸳鸯蝴蝶派小说家鲍天啸以讲故事的方式,步步逼近真相。而本来就擅长讲故事的天啸,在抑扬顿挫中像一部悬疑剧,渐渐投入了历史情境赋予他的戏剧角色,从怯懦猥琐到层层推进中完美实现了英雄壮举,引爆了另一颗炸弹,与林少佐同归于尽。故事情节点惊心动魄,环环相扣,虚实难辨,人物形象多样丰满。尤为精彩的是小说戏剧性的反差美,不仅鲍天啸集中了懦弱投机与家国情怀的反差,并由此产生性格曲线和丰富性,而且整部作品情境与细节都具有这种反差,如封闭与开放、残酷与温情、侠骨与柔肠、日常生活与恐怖高压、“偷”食与分享、饥饿与美食等等,大俗大雅,巨大的戏剧张力使小说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震撼力,令人着迷。

而戏仿小说《空山》,是东君与大众文学的对话之作,他植根文人传统,调动丰沛的想象力,挖掘传统小说文脉,生发叙述艺术新质,在浓郁的东方文人气息中,沉潜流动着一种古雅精致的叙述气韵,风神能见。艺术形式多样化探索的还有《慈悲》里路内的叙述耐心,哲贵《卖酒人》叙述的精准与分寸感,罗伟章《声音史》的艺术野心等。更有颇具独特性的罪案小说,如宁肯的《塔》在精神叙述的追求中,深度挖掘罪与罚之间生命意志的对抗,以彰显艺术张力、精神强度与隐喻性。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军事文学的优秀作品:西元的《死亡重奏》、王凯的《沙漠里的叶绿素》等,前者凝重恢弘,后者精细向上。尤其《死亡重奏》是近年少见的以“战壕里的真实”直面战争惨烈与人的精神,以及对个人与国家、战争与和平的深刻反思。小说运用音乐形式,讲述了朝鲜战争中一个无名连誓死守卫高地,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故事,有着独特的审美形式、现实眼光、历史容量与精神意蕴。汇同前述阿来、石一枫、尹学芸、肖江虹等对现实主义叙述的新表现,可以说,本届优秀作品多样化的艺术探索,植根于传统,都或多或少创造了自己小说样貌独特的美感,实现了各自的美学建构,以及广阔的美学多样性。

可惜,遗珠之憾永远都有,本届文学奖与许多优秀作品擦肩而过。一如受约的本文,我只能重点评论获奖作品,兼及前十,止步前二十,凡事都有其局限性。所幸,文学的新生代业已成长成熟,他们作品的品相不止于才子气象,不止于作品精神质地的优良,还在于作品体现的艺术新质与多样探索,中国文学的未来可期。